

2001.14

印尼僑生 馬來由文學研究

耶谷·蘇瑪爾卓 (JAKOB SOEMARDJO) 著
林萬里 譯



印尼侨生 马来由文学研究

耶谷·蘇瑪爾卓(JAKOB SOEMARDJO) 著
林萬里 译

本书出版喜获

宋良浩先生赞助

谨此致谢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印尼僑生馬來由文學研究

作者：耶谷·蘇瑪爾卓(JAKOB SUMARDJO)

譯者：林萬里

封面設計：林萬里

出版：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6-6A 好德商業大廈 6 字樓 A 室
HOLDERY PUBLISHING ENTERPRISES LTD.

Flt A, 6 / F, Hody Comm. Bldg.,

6-6A Hart Avenue, T. S. 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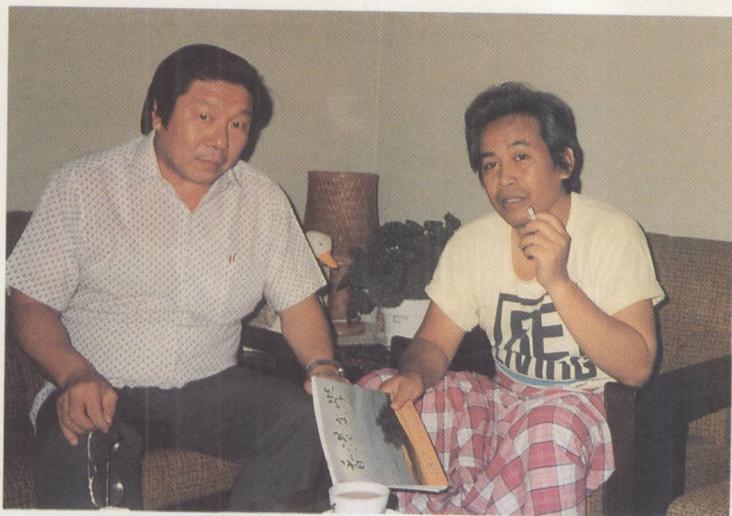
Tel. 2368 0632 Fax. 2723 1401

版次：一九九八年十月

國際書號：ISBN 962-449-258-1



林万里



林萬里与耶谷·苏玛尔卓合影（1988年于万隆）



林萬里与苏尔梦合影（1988年于巴黎）

译者简介

林万里原籍福建省福清县。1938年生。印尼万隆市清华中学高中毕业后赴中国升学。1962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1963年返回印尼经商。60年代中期崛起印华文坛,以林立笔名写文学评论。另写短篇小说刊于香港徐速先生编的《当代文艺》。曾辍笔20年,1986年重新写作。除小说外,另着重研究翻译有关《印尼侨生马来由文学》交香港刘以鬯先生编的《香港文学》发表。1990年由新加坡岛屿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结婚季节》。1997年编选《印华短篇小说选》交香港获益出版社出版。1998年把翻译的耶谷的论文结集《印尼侨生马来由文学研究》出版。

序 文

独具一格的文学

—— 华裔马来语文学

北京大学印尼 - 马来文化研究所所长
梁 立 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尼存在一种独具一格的文学——华裔马来语文学。这个文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存在,过去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和贬抑,甚至有人不承认它是整个印尼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法国学者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发表一部专著《印尼华裔的马来语文学》(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以大量的翔实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的存在和它的贡献,这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成为印尼文学研究中新的课题。近年来,印尼文学界对华裔马来语文学的研究有所进展,印尼的文学评论家耶谷·苏玛尔卓(Jakob Soemardjo)就写了不少关于印尼华裔马来语文学的

专论,对华裔马来语文学的发展历史、文学内容和特点做了比较深入的评析,并对华裔马来语文学的地位、作用和贡献予以比较客观的历史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从整个印尼学术界来看,印尼华裔马来语文学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介绍得还不够充分,人们对它的偏见和歧视尚未彻底消除。如今林万里先生把耶谷·苏玛尔卓的主要论文译成了中文,并和他本人的研究论文及对有关人士的访谈合集出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说来了及时雨,相信会引起更多人对华裔马来语文学的兴趣和关注,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谈论华裔马来语文学时,人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它是否归印尼文学的范畴?关于这个问题,早在60年代初,著名的华裔文学老前辈梁友兰先生在其专著《华裔印尼文学》(SASTERA INDONESIA - TIONGHOA)里就提出了自己明确的看法,他说:“我们应当把它(指华裔马来语文学—引者)看作是属于印尼民族的,因为其作者现在已经成为印尼人了,而其作品也是用印尼语写的。”后来许多国内外学者也对此提出自己的明确看法。例如1971年英国学者华生(C. W. Watson)发表的专论《印尼现代文学之前的初步探讨》(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Antecedents of Modern Indonesia Liture)也明确提出华裔马来语文学是“印尼现代文学的先声”。而德德·吴多摩(Dede Oetomo)在翻译苏尔梦的《马来语的华裔文学》(SASTRA CINA PERANAKAN DALAM BAHASA MELAYU)

的译者序言中则提出呼吁：“也许现在是最终承认这个华裔文学是印尼文学家族中的亲弟兄而不是外族兄弟的时候了。”应该承认，华裔马来语文学的诞生、成长和结束，是印尼殖民地社会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它是属于印尼整个社会的，反映整个印尼殖民地社会在一个历史时期里的现实，并对印尼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对印尼语言和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印尼现代文学之前的近代马来语文学是由两个不同来源的文学所组成：一是由古典马来语文学演变而来的，以马来作家阿卜杜拉·门希(Abdullah Bin Abdulkadir Mun-syi)为先驱，所使用的语言叫做“高级马来语”；一是由通俗的市井马来语文学发展起来的，所使用的语言叫做“低级马来语”或“华裔马来语”。其实，把马来语言截然分成高低两类是不科学的，因为基本上是属于一种语言，只是雅俗不同而已。所谓“高级马来语”，一般为宫廷和官方以及古典文学所使用，属“阳春白雪”的语言，通行于上层社会，面比较窄。而所谓“低级马来语”是广泛通行于市场上的一种混杂语，是最大众化和最实用的社会交际用语，应该叫“大众马来语”或“通俗马来语”更为恰当。该语言起初不大规范，发展成为通俗新闻语言和通俗文学语言之后，不断得到丰富和提高，以至于成为沟通印尼全国各族人民的近代社会的通用语。20世纪初，印尼出现民族觉醒。民族运动的兴起极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语

言作为全民族的战斗和统一的武器。已有广泛社会基础并实际上已成了各民族间的媒介语言的近代马来语便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印尼民族的共同语。在1928年的印尼青年代表大会上被正式确认为印尼民族的唯一民族语言，改称印度尼西亚语。由此可见，现代印尼语是从近代马来语演变而来的。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所谓近代马来语应包括近代“高级马来语”和近代“低级马来语”，也就是说成为现代印尼语基础的是上述两类马来语，不能把“低级马来语”排斥在外。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讲，“低级马来语”要比“高级马来语”更早更直接地介入了民族运动，并且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印尼早期的民族运动所使用的传播媒介和进行的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大都借助于通俗易懂的“低级马来语”。现代印尼语是印尼民族觉醒和民族运动的时代产物，难道可以把曾经对民族运动起重大作用的“低级马来语”反而排除在印尼语的源流之外吗？同样，现代印尼文学也是现代印尼民族觉醒和民族运动的时代产物，也应该说是在近代“高级马来语文学”和“低级马来语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初期，“低级马来语文学”与民族觉醒和民族运动的关系尤为密切，因此更没有理由把它加以抹杀。

近代“低级马来语文学”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印尼民族觉醒的前夜，其作家大都非马来族人，甚至非原住民。其中人数最多、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是华裔作家，因此有人称之为“华裔马来语文学”。而华裔马来语文学的

出现也并非偶然，乃是印尼殖民地社会发展到近代的伴随物，它是殖民地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19世纪下半叶，印尼殖民地社会开始从封建割据的自然经济向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逐步过渡。与此过渡相适应的近代语言和文学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当时的殖民地社会里，从经济能力上和文化教育上讲，华裔已经具备了从事马来语文工作和马来语文学创作的条件。印尼最早出现的马来语报刊有不少是由他们创办的，如1868年的《泗水之星》就是由华裔创办的最早的马来语报纸之一。而1876年创办的《马来号角》则已开始连载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通俗马来语译文。到1896年，据统计印尼已拥有17种杂志和13种马来语和爪哇语报纸，在全国已初步形成报刊发行网。与此同时，华裔也开始涉足印刷出版业，拥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和出版社。正是这些华裔创办的报刊和出版社为华裔马来语文学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不仅为华裔马来语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和渠道，同时也为他们招徕大批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这些华裔报刊和出版社，华裔马来语文学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因为官方报刊和出版社绝不会给“低级马来语”作品以发表的机会。

华裔的文学活动是从大量翻译改写中国古典演义小说开始的。从19世纪80年代起，华裔用“低级马来语”译改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形成了一股热潮，翻译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令人惊叹。除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华裔也翻译改写不少西方文学名著，如李金福早在1894年就同韦格斯

合译了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华裔从19世纪80年代起的大量文学翻译实践,不仅起到了向印尼介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作用,也造就了华裔的写作人才。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就是由从事文学翻译进而从事文学创作的。因为到了一定程度,人们便不满足于那些“舶来品”文学了,特别是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更希望能看到反映他们自己社会现实的作品,而作者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创作直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这个时候,报刊有关社会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大量报道又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素材。华裔马来语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兴起的。

华裔马来语文学一问世便大放异彩,表现出与传统的“高级马来语”古典文学迥然不同的风格及特色。如果要加于归纳,大概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华裔马来语文学创作大都取材于报纸刊登的社会重大新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小说题目下面往往写上“某时某地发生的真实故事”,故最能反映当时印尼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矛盾;二、主题和题材多样化,涉及当时印尼殖民地社会的方方面面,除华人社会外,也涉及白人社会和原住民社会,所以它向人们提供的是印尼近代殖民地社会的全景图象;三、小说的主人公是当时印尼殖民地社会的各种典型人物,其中被称作“姨娘”(NYAI)的土著侍妾扮演了重要角色,她是当时殖民地社会备受欺压的典型人物,往往是各种矛盾的一个焦点,通过她的身世遭遇可以看到当时错综复杂的民

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四、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都突破了马来古典文学一成不变的传统模式，向现代小说创作的方向迈进了--大步；五、采用了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低级马来语”，从而打破了“高级马来语”对文学的垄断，把“低级马来语”提高到文学语言的水平，为马来语日后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语打好基础。

华裔马来语文学如果从翻译改写中国和西方文学作品算起，实际上已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据法国学者苏尔梦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表的翻译改写作品和华裔自己创作的作品多达 3005 种，译者和作者总数达 806 人。其中华裔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有 1398 部。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但华裔马来语文学的意义主要不在量上，主要在它对印尼语言和文学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其功不可没：

一、它填补了印尼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般认为，19 世纪中叶的马来作家阿卜杜拉·门希是马来“新文学的曙光”，是马来近代文学的开端。可是，在他于 1854 年逝世后，将近半个世纪里却没有看到有后继者出现。马来古典文学仍旧停留在旧的基础上远远落在时代的后头，其作品严重脱离现实，不能反映印尼近代殖民地社会的重大变化。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在 20 世纪印尼现代文学诞生之前就没有反映印尼近代社会发展的近代文学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华裔马来语文学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如果把这个文学排除在印尼文学史之外，那就等于割断了历史，在

印尼文学史上就会出现上述的空白。二、它首先走出了印尼旧窠臼,把印尼文学引向现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在创作内容上,它克服了旧文学脱离现实生活的偏向,把印尼文学从虚无的宫廷神话中拉回到社会现实生活中来,使文学更加贴近人民大众。在文学形式上,它摒弃了旧文学一成不变的旧体传奇故事的式样,通过借鉴西方近代文学而改用近代小说的式样和采取近代小说的写作方法与技巧。这都为印尼文学走向现代的发展开辟道路。三、它把“低级马来语”提高到文学语言的水平,并使之普及于全国。这就为印尼民族共同语——印度尼西亚语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四、它不但有文学价值,而且还有认识价值。由于它是从当时印尼殖民地社会所发生的真人真事中汲取创作素材,所以它能及时反映当时印尼殖民地社会的本质矛盾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在同一时期里的印尼文学作品是难以看到的。

华裔马来语文学是在印尼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印尼独立后,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在双重国籍问题解决之后,绝大部分的华裔都成了印尼公民。老一代的华裔作家仿佛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一个个退出文坛,很少再从事创作了。而新一代的华裔作家则已完全归化,融入到印尼现代主流文学里去了。华裔马来语文学的产生和结束乃是印尼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在印尼历史上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有过重要的贡献。我们应当还它以本来的历史面目,给它

以应有的历史评价。荷兰著名学者德欧教授(A. Teeuw)在看了苏尔梦有关华裔马来语文学的专著之后,也觉得有必要作历史的反省。他在一篇评论文中说:“她(指苏尔梦——引者)不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同时要迫使那些与此有关的学者,包括本评论的作者,对他们所从事工作的某些概念进行痛苦的重新评价。”他的结论是:“华裔马来语文学是通往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发展链条中的主要一环”。这个结论应该说是科学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最早向我介绍林万里先生的是法国学者苏尔梦,她把林万里先生的一篇有关华裔马来语文学的论文复印件寄给了我。后来我有机会与林万里先生结交,他那热心文学事业和执着的钻研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如今《印尼侨生马来由文学研究》出版了,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这是他多年研究华裔马来语文学所结下的硕果,对我们研究印尼文学和全面了解及评价华裔在印尼历史中的作用和贡献有着重要的学术和参考价值。

一九九八年六月廿五日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Sambutan Penulis

Undak repantamup saya mengucap-
kan terima kasih kepada Bapak Lim
Wan Lic yang telah berinisiatif mengumpul
ketapi ketapi & berinisiatif menjeri-
walkan karangan-karangan saya
tentang kebudayaan kaum perahu-
an Tidjilwa-Indonesia. Dan karangan-
karangan itu akhirnya dipericampikan
juga oleh Bapak Lim untuk dapat
terbit dalam bentuk buku.

Sebelumnya, buku ini tidak pernah
tema khusus antara lain karangan
dengan karangan lain, karena
mendang usahanya semula ditulis
sebagai karangan lepas di surat
kabar umum.

Oleh Bapak Lim, setelah dikumpul,
dintahakan ada tema yang membina
berbagai karangan itu dapat menjadi
satu buku dengan tujuan mem-
perkenalkan kaum extra ini pada
ura awal persembangannya.

Undak-undakan buku ini
dapat merangsang pembaca untuk
mengetahui lebih lanjut kebudayaan ini
di Indonesia.

(译文见后页)

Penulis
